

学科建制化的逻辑及其前提批判

——新文科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

王晓兵

摘要: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国家发展对理论工作的基本要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文科建设和发展绝不是原有学科上的简单延续,它必须具有更为整全而深入的理论建构,以超越当前学科建制化造成的理论困境。学科建制化形成的中层理论有着基于常态正态思维针对某一狭窄领域从事常规研究的特点,导致它对变局或极端状态应对乏力。新文科建设绝不是凌空虚蹈,在原有理论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对此前多年理论工作的成果积累的充分占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以实践概念为基础,对当前诸理论的前提预设、价值倾向和理论展开逻辑加以前提批判,解除隐蔽前提的逻辑强制,推动理论思维的跃迁,构建适应大变局下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新文科体系。

关键词:建制化;理论领航;前提批判;新文科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2.05.0016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的文科,为适应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以求发展,对域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学习是理论工作的焦点。但同时这也造成了外部反思的问题,外部反思“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只是先验地把抽象的原则运用到(强加到)任何一种内容之上”^①。作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理论逻辑的外部反思形态有其时代背景。新时代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从全球秩序的参与者身份,到如今需要承担大国责任的全球秩序的建构者角色。角色的转变要求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不但要通过对域外理论的学习来达成国际共识,更需要以根据中国并面向世界的思考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是2020年11月发布的《新文科宣言》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的发展原则和“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那么,新文科建设要如何担负起这一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呢?首先需要破解的是这样一个困境:一个新的理论质点或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提出后,随即被建制化的学科研究范式“缝合”和“消化”,进而重新落入常规研究中去,失去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创新,只是在常规、常态的狭窄领域从事中层研究,造成对大变局时代的现实应对乏力的局面。

由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新文科建设需要对学科发展业已积累的成果加以批判性承继。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摆脱现有学科建制化造成的常规的、狭窄领域的中层研究范式,已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工作,是新文科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连带影响下,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学科发展过程中学科建制化对学术研究的根本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都在一个常规的思路里,在一个既定的范式里,在一个狭小的中层研究里。一些无关痛痒的人与他的时代有着非常大的距离,在没有切身、切肤的体会这种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常规研究。因此,常规研究的方法、理论和基本模式也大行其道,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我们突然面对一个极其危急的时刻,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像平常百姓那样,或者是像一些公共意见那样去面对,很

基金项目:暨南大学文明广州与文化强国研究基地自设项目“广州城市发展与青年文化身份的在地化建构”。

作者简介:王晓兵,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州 510632; wangxiaobing0927@163.com)。

^① 吴晓明:《从社会现实的观点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变迁》,《哲学研究》2017年第10期。

难提出严肃的、深入的思考。”^①常态的正态分布式的常规研究和中层研究其弊端在于无法为应对变局或危机的局面提供理论支援。“面对真正的突变和社会急剧变迁,我们必须突破常态和正态思维,把那些常态思维设法排除掉的反常的、疾病的、变化的、风险的、预料不到的、潜在的所有人心和社会问题,都应该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思考范围里,只有这样,当危机来临的时刻,我们才会有丰富的、沉稳的、有效的反应,并将这些准备彼此连带,发挥出协同的成效。”^②那么,在变局、危机和全球突发事件的局面下,要提供理论视角、智识支援就必须跳出原有学科建制化工作逻辑的桎梏,在据有学科发展历程中的思想积累的前提下,通过哲学反思的前提批判方式敞露前提约束,解除逻辑强制,实现思想跃迁。

正因如此,新文科建设并非是在原有学科发展逻辑的延长线上的自在生长,它是通过对原有学科发展逻辑的前提反思,实现理论层次的跃迁。同时,新文科建设也不是对原有学科发展逻辑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充分占有原有学科发展历程中产生的诸多成果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应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基础,以理论领航的方式,在占有成果和反思推进的辩证互动中推动新文科建设和发展。

一、学科的建制化倾向及其问题

(一)建制化是学科发展的基本倾向

建制化是学科发展的基本倾向,这一点在精神分析发展历程中有特别明显的表现。当精神分析传入美国后,精神分析学会、从事精神分析临床的资格等学科建制化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最后发展到斥精神分析开创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工作为“业余”的程度^③。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一门学科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中,建制化是其得以传播和发生影响的重要一环,由此纽约协会“谴责业余精神分析行为”这样向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宣战的“弑父”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建制化同时也是学科形成自身思想范式,作为“常规科学”对某类社会现象具有解释权力和解释合法性的客观要求^④。但建制化同时也是存在弊端的,其最主要的弊端在于一旦学科作为“常规科学”通过其思想范式解释说明某类社会现象,并范导人们的行为之后,作为学科共同体的研究者就会在这一思想范式之中运思并传承思想,客观上形成一知识生产的“共同体”,这对思想的革命性推进是有阻滞的^⑤。学科越是划分的精细,在细分后的领域中,思想推进工作遭遇这种阻滞的状况就会发生的愈频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科交叉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出现。那么学科交叉是新文科建设的一种方案吗?我认为不是。学科交叉不是新文科建设的方案,而仅仅是学科建制化的副产物。

(二)在学科壁垒与学科交叉现象中理论的外在化质性

学科划分的演化历程与生产生活关系变化密切相关。正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学科门类的划分也随之不断细化。这种不断细化表现为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的不断细分。其中极端者,甚至出现了同一个一级学科下诸二级学科之间壁垒森严难以形成有效对话的局面。如此明显的状况自然不会被忽视,正是在学科随着研究对象日趋细化、专门化从而形成学科壁垒的同时,学科交叉的现象愈发增多。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处理本学科具体研究对象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一直被视为一种新颖的创造性的研究范式在各学科中被广泛采用。

① 渠敬东:《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清华社会科学》2020年第1辑。

② 渠敬东:《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清华社会科学》2020年第1辑。

③ 孙飞宇:《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71-73页。

④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46页。

⑤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第148-152页。

学科形成壁垒的合理性—合法性基础是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或者特定的研究方法,并借由这种合理性以自身独特的“专业性”排斥其他研究方法的介入。这种情况随着学科划分越发走向细碎,学科间关系已经很难通过回溯学科发展史的方式找到细分学科之间发生学意义上的深层联系,由此在面对具体研究对象时学科间壁垒森严的对峙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对治的办法,在交叉使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时,其合理性—合法性的基础是问题导向,即一个具体问题本身被视为是前学科的。甲学科可以对问题作出基于甲学科“视角”的分析并给出对策 A,乙学科也可以对此给出基于乙学科“视角”的分析并给出对策 B。比如一刑事案件可从刑法学专业的视角考虑,也可对此“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思考。对一惯常被当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事件,也可做基于政治学或社会学视角的考察。这种“基于”另一个视角的问题考察,多多少少是对板结的学科壁垒的一定程度的消解。

但这种交叉得以发生的合理性—合法性隐含着—个逻辑:诸学科是外在于问题的,各学科的专家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看”某具体问题如何,即所谓“基于某某视角”。如此一来,即便新的“视角”可能因描述和构造问题的角度造成得出对策不够整全甚至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也可因其仅仅是“基于”单独学科的“视角”,似乎就拥有了豁免权。这一点在经济学领域一些学者给出“基于经济学视角”的针对现实的分析和相应行动导向,而后被证实缺乏完整性时的豁免权逻辑能够看到。以此来理解“一个只懂得法律的法官不是一个好法官”这句话中含有的对“基于法学的视角就应该……”逻辑的批评,对法学理论研究者来说同样是意味深长的。

这样的学科交叉在更深层次上存在的问题在于任意性,以及任意性造成的理论对问题的外在化(学科对现实的外在化)。既然是“基于”各自学科“视角”的分析。那么这个“视角”看向什么对象,如何看,就不是作为问题对象的社会现实决定的,而是这个外在的“观察者”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把握和构造的。这样一来,“视角”如此这般切入问题、描述问题从而构造问题的合理性—合法性就是存疑的。又由于该视角的“基于”本视角的思维方式“逻辑的”得出的“专业”结论,如上文论述的那样对复杂问题走向的豁免权,就难以避免地走向单纯的清谈甚至空谈,进而产生理论自顾自“繁荣”,却无法为具体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援的困境。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去分析新文科发展的逻辑,探索新文科建设的科学路径,则新文科的发展就绝不会是从学科交叉出发的逐渐衍化,也不是一个新的学科带来一种新的学科“专业”壁垒,从而完全与现有学科逻辑及其成果的断然隔绝。而是将当前诸学科在描述、构造和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现实”的理论活动作为整体加以反思。将理论作为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从知识生产、理论构造问题的逻辑等观念活动入手,寻找作为理论方法的学科与作为问题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为理论参与现实、介入现实、提供智识支援并推动实践发展提供基于社会现实的内在基础。

二、学科建制化的对象化思维及其外在化弊端

(一)对象化思维方式主导的理论介入现实的新方式

随着学科的建制化不断强化,深层改变的还有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形态,即作为理论与现实关系形态核心的理论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对象化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巩固。具体而言即:从学科理论出发去观照、描述和构造现实,进而形成理论化的现实的过程。这一新的关系形态的底层逻辑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分和大大小小的建制团体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我们说从学科理论出发去观照现实是一种全新的理论与现实关系形态,是基于学科建制化形成并逐渐兴盛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与现实关系形态对比而言的。对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古代的研究方式与近代的研究方式的比较,极为精彩地说明了这一理论与现实关系形态的变化,在理论介入现实方式上的质性差异:“古代人的研究是真正的自然意识的教养和形成。古代的研究者通过对他的生活的每个细节都作详尽的考察,对呈现于其面前的一切事物都作哲学的思考,才给自己创造出了一种渗透于事物之中的普遍性。但现

代人则不同,他能找到现成的抽象形式;他掌握和吸取这种形式,可以说只是不假中介地将内在的东西外化出来并隔离地将普遍的东西(共相)制造出来,而不是从具体事物中和现实存在的形形色色之中把内在和普遍的东西产生出来。”^①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现在尝试以问题导向的方式来消解学科建制化带来的对实际问题的切割之弊端时,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作为现代性背景下的理论与现实关系的支配形态,我们用来消解学科建制化之弊端的问题导向,其寻找、描述问题的理论背景和价值前提就已经在构造问题本身,决定着问题的性质、结构和形态,也因此决定着问题的解决对策。正因如此,问题的焦点便如黑格尔所说,“现在的工作与其说在于使个体脱离直接的感性形式使之成为被思维的和能思维的实体不如说情形相反,在于扬弃那些固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②即在充分占有当下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哲学反思所特有的前提批判的方式回到现实的基础上,从马克思所言有着社会历史规定性的“实在主体”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发展,真实地把握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这种对象化思维方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在国际贸易、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与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相伴而生的。具体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有如下定义:一个物可以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为了避免误解,恩格斯做了补充“而且不只是简单地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作为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租的粮食,还是作为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③马克思在这里要提示我们的是:作为物的商品背后是一种社会关系。交换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却与此前的交换有着本质差别。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是围绕着使用价值展开的,这是农业社会的特点,即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仅把多余产品与他人持有同时又是自己所需的物品进行交换。黑格尔所言的古代人的研究其社会根源即来自于此。人们面对的首先是“特殊的物”,是有着质的差异的使用价值。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提示我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④。当我的生产不再围绕使用价值展开,生产就是为了能够通过交换让产品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以便完成资本的增殖。围绕使用价值展开的活动让位于围绕交换价值展开的生产活动。新的生产活动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价值只有量上的差异而没有质上的不同。交换的实现,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实现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使用”的共识。韦伯等人看到的工具理性坐大的现象,其背后正是工具理性通过效用、效率等量的衡量为基础的普遍性作为核心,把地方性的价值理性挤到了边缘。围绕质性差异展开的生产方式和基于此种生产方式的“古代人的研究”的地方性差异化文化形态被以贸易为核心,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围绕抽象的仅有量上差异的普遍性展开的生产方式,以及基于此种生产方式的“标准化”文化形态所取代。学科的建制化正是作为推行“标准化”进而实现“使用”共识,进而推动交换的顺畅发生的观念工具应运而生,且逐渐壮大的。也正因如此,从学科建制化这一前提出发,标准化、常态化、抽象普遍化在不同思想旨趣、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理论方法的学科那里,甚至在观点完全相反的学科那里,都作为底层逻辑而支配建制化过程的深层社会原因所在。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5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第24-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页。

(二)对象化思维方式的外在化弊端

当我们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入手,即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①。我们就能够深入到学科发展的内部看到当前的学科建制化在其形成逻辑上所内蕴的矛盾,亦即在对它的“肯定理解”中看到它的“暂时性方面”,在“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的角度去历史性的理解。学科建制化的对象化思维方式的外在化弊端已十分明显。对此鲍德里亚和齐泽克分别从意识形态维度给出了精彩的说明。

鲍德里亚的论证指向的是学科建制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以学科理论体系来观照现实,从而改变现实,甚至“制造”“现实”的逻辑。鲍德里亚认为,一旦生产开始围绕仅有量上的差异的价值逻辑展开,那么能够完成交换从而实现资本增殖就成为核心目的甚至唯一目的。这一逻辑发展到极致,就是“交换价值化的使用价值”,也即人为地制造可以交换的“使用”。鲍德里亚早期的物体系思想,正是要说明物不断地脱离使用价值,发展到为了交换而去凭空制造“使用”的动因。具体是通过不同符号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创造”交换价值,让符号的区分功能成为一种价值增殖的商品,而物被编码在一套符码体系之中,其“使用”的具体内容转向依赖符码系统给予的“身份”来界定^②。虽然鲍德里亚以所有社会都有依赖于需求的消费,就草草将这一主要消费领域打发掉,从而夸大符号消费的影响。但在鲍德里亚的分析中,通过编辑符码系统的方式来影响社会生活的逻辑已经昭然若揭,值得认真对待。

齐泽克的论证则是直接指向作为建制化的学科本身:一旦学科范式确立,对这一范式的维护意愿将是空前的。齐泽克用“剩余快感”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新变化。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这一阶段的启蒙,是一种通过祛除蒙昧把思想从“被蒙蔽”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则是“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仍然要去做,因为在短期内,环境的力量与他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在说着同一种语言,它们在告诉他们,这事情必须这样做。”^③这一状态意味着即便是没有“蒙蔽”的存在,“清醒”的人们仍然会以“被蒙蔽”的状态在意识状态的支配下去行动。齐泽克的思考虽然因其唯我论的经验主义前提而得出资本主义永恒存在的错误观点,因而未能进入历史唯物主义一度。但他真实地指出一种学科范式作为一种观念束,它的终结也许并不像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那么容易,虽然库恩已经意识到了作为学科“共同体”的成员们对原有范式的维护,但库恩想象到的困难仍是从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启蒙逻辑,齐泽克则看到了变革的更深阻碍,这种阻碍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上层建筑的深层影响。

虽然鲍德里亚和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在观念形态上的表征及其原理的指认与揭示是富有启发性的,但因其以经验主义为前提,未能进入历史唯物主义一度来看待这种新变化,从而造成其虽有着“批判”甚至“激进”的理论外观,却仍是在资本主义的“似自然性”和“永恒发展”维度思考问题,从而得出新变化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鲍德里亚)结论,并在“永恒革命化”的外观下将“驱使资本主义进行永恒的发展”这一隐蔽前提接受下来^④。正是在隐蔽地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似自然性”和“永恒性”基础上,无论表现为怎样激进的“批判”,最终导向的结果要么是对偶然性“事件”的期待、要么是用“出离”的方式退回到抽象的意识自由,或干脆就是承认资本主义的“永恒发展”。这样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② 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0-217页。

③ 转引自唐正东:《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0页。

④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光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①,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是以否定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共生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社会问题的一种情绪化表态而已。

以此种经验主义方式为理论前提铺展开来的理论及其衍生观念,在根本上缺乏历史的维度。它通过对经验现实的理论化描述形成以某一核心概念为基石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的“分工”是如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亦如此)。理论的更替只能是基于新的社会现实的经验描述对原有理论的否弃来完成(李嘉图对斯密即是明证)。每一个否弃原有理论的新理论都仍然是以某一“不动”的核心概念为基石构造理论体系,“解释”社会现象。唯有内蕴历史性维度的“实践”方能打破这种“解释”方式的理论更替逻辑,让理论本身以一种历史性的形态介入现实,“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将理论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实现从“解释”到“改变”的理论旨趣的转变和理论层次的跃迁。正因如此,破解学科建制化造成的“解释”逻辑从而推动新文科建设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但这一转变并非易事,它事实上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新文科建设和发展的全程,即以唯物史观的具体化为内容: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实践为核心概念,通过对现有理论成果的持续地具体地理论前提批判,以回返的方式在据有此前理论成果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地理论发展。

三、学科建制化的前提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

新文科建设不是在原有学科延长线上的继续,这一点是新文科建设目标和任务内蕴的时代责任所决定的。但新文科建设也不是凌空虚蹈地凭空构造,它需要据有多年来理论发展的成果,但这种据有成果不是接受又或否弃,它应该是一种以理论的前提批判方式展开的扬弃。即:把原有成果纳入到新的思想框架——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之中,在敞露其隐蔽前提、解除前提的逻辑强制过程中实现理论层次的跃迁。这一前提批判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工作场域为区别于物质—精神二分模式的文化世界(世界Ⅲ),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工作对象为以世界Ⅲ为中介,通过前提批判,梳理和澄清文化世界(世界Ⅲ)与物理世界(世界Ⅰ)、精神世界(世界Ⅱ)的相互作用关系;工作的具体内容为对具体理论或观念的思想前提,在思想史—社会史一个体语境这三重背景下进行梳理和澄清;工作原则为基于区别于存在观点的思维方式和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一)“集体意向性”与“世界Ⅲ”:前提批判的场域

约翰·塞尔在他的社会构成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集体意向性”概念。塞尔认为诸如货币、婚姻甚至政府等社会实在与石头、树木等物理存在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他将前者归入他称之为社会性事实的范畴,将后者称之为无情性事实^②。他在社会性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政治事实这一范畴,并将其引到语言分析领域。大概思路是:(1)政治事实得以可能需要依赖制度的构造;(2)制度的构造需要人们“具有与之相符合的想法”(集体意向性);(3)为了“具有这些适当的想法,他们应该具有这样想的途径,这些途径都是象征的或者是语言学的范畴的”^③。社会构成问题通过集体意向性的概念转换为语言学分析的问题。塞尔的“社会性事实”及背后的集体意向性范畴突出了文化领域作为相对独立领域的自身运行逻辑,这与波普的“世界Ⅲ”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注意到了物质精神二分之外,文化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和独有的规律性。孙正聿教授曾撰文阐发波普的“世界Ⅲ”范畴,强调其开放出可供进行文化前提批判的“富有现实性的文化哲学视阈”。其理论逻辑在于:(1)“世界Ⅲ”作为文化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② 约翰·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3页。

③ 约翰·塞尔:《自由与神经生物学》,李步楼译,第69页。

越来越成为“世界Ⅰ”(物理世界)和“世界Ⅱ”(精神世界)的中间环节。在“世界Ⅰ”中的行动依赖于“世界Ⅱ”对“世界Ⅲ”的领会程度。因此(2)“世界Ⅲ”不是“世界Ⅱ”的单纯外在表现,“世界Ⅱ”也不是“世界Ⅲ”的单纯意识反映^①。综合上述两点,作为文化前提批判的哲学,其工作核心即在于通过澄清“世界Ⅱ”与“世界Ⅲ”的辩证关系(包括相互交织的双向互动过程:“世界Ⅱ”对“世界Ⅲ”的领会方式,“世界Ⅲ”对“世界Ⅱ”的作用原理),以此来介入、影响和推动人们在“世界Ⅰ”中的行动。这一点在塞尔这里被明确为语言学的分析,基于语言的公共性拒斥观念—意识的主观性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按照塞尔的思路,当以个体形态出现的观念—意识的主观性雌伏于公共性—客观性的语言分析后,学科建制化的逻辑在此又重演一番。正所谓“自从发明了钟表,什么时候饿,就不再是肚子说了算”。

无论是波普的“世界Ⅲ”、还是塞尔的“集体意向性”都从不同侧面为我们指出哲学反思的文化世界视域。从这里出发,以下几个原则是较为清晰的:(1)文化世界影响着人们在物理世界中的行为选择。(2)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以理论的方式介入现实是通过基于“世界Ⅱ”对“世界Ⅲ”的反思,以及通过对“世界Ⅲ”的领会反省自身从事理论工作的“世界Ⅱ”的不自觉的前提,在这一辩证互动的过程中以理论的方式参与到现实实践中,以哲学反思所特有的前提批判的方式,推动“世界Ⅲ”的发展。作为文化世界的理论基石和生成诸观念的理论母体的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内的广义文科,是我们从事哲学反思,并以此介入现实实践活动当中去的焦点。由此,新文科的工作领域(以现有学科累积成果为核心的文化世界)、工作方式(以文化前提批判为指向的唯物史观具体化)就是将作为目标和任务的新文科建设担负其时代责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二)前提批判的工作对象:观念的思想史—社会史—个体语境三重背景澄清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前提批判场域的“世界Ⅲ”是“世界Ⅰ”和“世界Ⅱ”相互作用的中介。也就是说我们的前提批判是基于作为“世界Ⅲ”文化世界基础地位的文科理论,通过该领域三重维度的具体反思具体推动理论的前提批判工作,包括:(1)思想史梳理即自身演进;(2)个性化展开即与“世界Ⅱ”的关系;(3)作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世界Ⅰ”之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具体以梳理新文科建设视域下学科发展问题来呈现这一具体的前提反思工作。

不论是塞尔还是波普,他们在通过“世界Ⅲ”和“集体意向性”范畴指认文化世界及其特点时,文化世界作为一个对象仍然是缺乏历史性一度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重新审视并澄清文化世界的特点及其运行原理,即唯物史观的具体化。

综上,当我们试图对当前观念场域中诸观念及其背后的理论进行理论反思和前提批判时,这一工作无论从理论的思想史历程、社会史、个体的理论展开语境三者任何一个维度入手,都需要通过这一维度与另外两个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入手,方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反思和前提批判。以从思想史维度切入为例,理论反思和前提批判,一方面是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展开。以学科的发展和分化来说,即对学科发展的思想史历程的社会因素加以考察。如:曾经国家—个人二分的理论领域,在何时又是以何种方式演化到国家—社会—个人三分的学科分类形态。这能启发我们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结构运行在学科领域的理论表征,从而看到黑格尔在市民社会论题上对斯密的批判性超越与李嘉图对斯密的超越背后的理论勾连,看到繁复的理论构造实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般规律的理论表征,从而穿透现象把握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发展规律,即在此领域的唯物史观的具体化^②;另一方面是以思想史与个体展开其理论的语境之间的关系。如斯密在何种理论环境下具体展开自己的理论创新,其理论逻辑的铺展过程中与当时观念场域中诸理论的交互过程如何。如以从社会史维度切入为例,则一方面是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的社会生产生活变化

^① 孙正聿:《“世界3”与文化的前提批判》,《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② 张一兵:《从斯密到黑格尔:市民社会话语实践中的复杂格式塔转换》,《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以何种方式具体影响学科分化的形态;另一方面是社会史与个人展开其理论的观念语境之间的关系。如社会生产生活变化在具体思想家展开其理论的过程中提供了怎样的问题意识。如以从个体语境维度切入,则一方面是思想史与个体铺展其理论的观念语境之间的关系,如个性化问题提出所直接面对的思想场域,个性化问题铺展所借助的理论资源所面对的理论对手;另一方面是个体语境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如个性化问题的时代精神要求,以及具体思想家提出问题的具体语境与所提出的问题的结构及其个性化分析思路与其语境之间的复杂勾连。

对三重背景及三者之间复杂勾连关系的结构式梳理,是为了说明理论反思和前提批判的具体工作对象并非某一领域,而是诸领域之间的关系。理论的前提批判即是在对当前观念场域中影响观念衍生和传播的理论的三重背景,它们在理论得以展开的前提处通过相互关系形成隐蔽前提的敞露。这是新文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通过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的路径建设和发展的方法论根基。

(三)前提批判的逻辑: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上述立足于文化世界的通过理论前提批判具体展开以推动学科发展的方式,首先会遭遇的批评是被指认为仅在“认识论”高度上思考问题,而未进入“存在”一度。在对哲学史的叙述中有“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生存论”的发展阶段的看法。基于上述思想史叙述的逻辑,把从“思维方式”角度入手的理论展开被视为“认识论”哲学,并进一步看做是“过时”的理论,用这样鲁莽的指认归类方式,就轻易否弃或者略过一种理论视角,显然是幼稚的。无论是“本体论”还是“生存论”作为一种理论,都仍然是一种认识,也因此需要经过认识论反省。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论反省对于理论反思和前提批判有着永恒的价值。在区别于“存在观点的思维方式”和“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之中,蕴含着以理论反思和前提批判的方式据有学科发展成果并推动新文科建设的理论逻辑及其运行原理。

高青海教授依照思维方式的不同将哲学的发展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从未分化的笼统的自然出发去认识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可称为自然观点;从脱离人的自然出发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属于存在观点;从脱离自然的主体(即意识)出发去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属于意识观点;从抽象的人出发去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属于人本学观点;从人与自然的具体统一,即从具体的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去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属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①。在这一思维方式的区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史发展的社会史背景,也由此可以掌握从社会史的视角来看待思想史衍化的唯物史观方法论。主客二分因人类社会生产发展而发生一系列形态变化。在生产力较低的时期,人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从属于自然,在认识上也就归并于自然,从而形成了从自然出发来认识各种问题的“顺应型”思维方式。在生产力发展迅速的时期有所谓“主体的觉醒”,形成了从人的意识出发来认识各种问题的“控制型”思维方式。在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约束条件时,人们又开始重新思考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人在世界之中生存出发来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成为热门。思维方式的背后是人特定的实践活动方式,是人的实践活动把自身变为主体抽离出自然界,同时将自然界变为对象。主客二分的认识活动是实践造成的,同时也只有在合目的与合规律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将此二分统一起来。而理论,正是作为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活动,塑造着人们把握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范导人们在世界之中以何种方式行为。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入手,对观念场域中诸观念得以衍生和传播的基本理论其前提预设、理论展开和价值倾向等进行重新理解,这是使得具体理论能够形成前提自觉和价值自觉,进入历史唯物主义一度的根本途径。

^① 高青海:《高青海哲学文存》第1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

四、结语:一种基于学科建制化批判的唯物史观具体化路径探索

新文科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自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以来,有一系列文章发表,但检索既往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新文科建设还仅仅是作为研究的限定词或语境要素而存在,“新文科视域下的……研究”几乎是唯一的研究思路。与此相类,诸多以新问题、新方案或新视角尝试推动理论发展的理论质点,均被重新纳入建制化了的学科既有研究范式中作为“质料”而消化掉。区别仅仅在具体研究的限定语。理论研究也就此重新回到了学科建制化营造的研究范式下的常态研究、狭窄领域的中层研究,进而无法为全球变局的新形势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援。正因此,我们尝试在学科建制化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推动以唯物史观穿透复杂的个别表象把握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发展一般规律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化。具体到本文:是对对现有学科建制化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新文科建设工作如何展开为论题,以对学科建制化问题为前提批判的对象。通过梳理前提批判的场域、对象、批判内容、原则遵循等,示范理论的前提批判具体展开的原理和历程。从基于某一既有概念体系去“剪裁”被作为“质料”的社会现象,并以“构造”的方式把新社会现象或新的理论讨论缝合进原有概念框架的“解释”形态的学科建制化逻辑,推进到穿透现象把握内在本质规律的唯物史观具体化的“改变”形态的理论中。建制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倾向,因此,解除建制化带来的逻辑强制的前提批判工作也就必然是贯穿理论发展全程、持续进行且在诸理论及其衍生观念处具体展开的。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推动新文科建设等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工作方式和实现路径。

The Logic of Disciplin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Critique on Its Premise ——Theory Guidance of Marx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Wang Xiaobing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P.R.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oretical work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aced on the changes which have been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is not a simple continuation of the original disciplines. It must take a more holistic and in-depth thinking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middle-level research under the current discipline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normal thinking of the middle-level theory is weak when coping with the changing situation or extreme states. New liberal arts must be as the theory guidance, but it is by no means unrealistic. We need to carry out in-depth exploration on the accumulation of theoretical work for many years, launch the logic premise criticism for theoretical preconditions, value tendency and theo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leap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guided by Marxist theory.

Keywords: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ory guidance; Critique on premise; New liberal arts

[责任编辑:邵世友]